

春色十分，桃花独占八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或许没有哪一种花能够像桃花一样，被赋予如此丰富的内涵：在先民眼中，她是渺远的上古神话。《山海经》有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

门，万鬼所出入也。”在诗人笔下，她是娇媚的女子容颜。《诗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因其艳丽的花色和娇媚的姿容与女性相联系，终由一首《题都城南庄》勾勒出“人面桃花”的经典语境。在高人心中，她是隐逸的避

世之所。《桃花源记》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浑涵之境，既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乌托邦”。“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春意泄，不如走进桃红深处，窥见被埋藏的文学意象。



桃红深处，藏着半部古代文学史

陆纾文

【桃花源】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这样的图景不仅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东晋年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田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文中所想象的宁静、富饶、淳朴的理想社会，引起了历代文人和艺术家对“桃花源”的臆想——他们或追加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或附会有关古迹，或创作大量的咏叹诗文，或将有关题材付诸画笔。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长久以来，有关“桃花源”究竟在何地的争论从未停止。虽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以武陵渔人所见为线索开篇，将人们寻觅“桃花源”的足迹基本锁定在了“武陵”境内，但这实在是一片太过广大的区域。

一般认为，“桃花源”位于湖南常德的桃源县。这里自晋代起便是文人墨客追寻桃花源的地方，宋代时干脆更名“桃源县”，如今更是常德的一张重要名片。湖北十堰、安徽黟县、重庆酉阳也都有以“桃花源”为名的景点。

此外，关于桃花源到底是在武陵还是别处，还有一些争论。

那么《桃花源记》通篇皆是陶渊明的臆想吗？也不全然，否则陈寅恪不会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写下：“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桃花源人避居山中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桃花源记》结尾所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便有史实可溯。

《太平御览》卷五〇四引《晋中兴书》云：“刘驥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困，一困开，一困闭。或说困中皆仙方秘药，驥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记载，所叙之所见与桃花源颇为相似。

总而言之，桃花源并非实有其地，而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文学意象，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传闻为素材，寄寓自己理想的叙事浑涵之境。在附于《桃花源记》后的《桃花源诗》中，陶渊明写道：“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这幅逃禄而归耕的图景不仅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人面桃花】

《本事诗》对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发挥想象，成为影响后世的“酵母”。此后，“人面桃花”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笙歌袅袅，不绝如缕——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周南·桃夭》中这些描绘女子出嫁的诗句，或许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将桃花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品。

《诗经》为何以桃花来祝福新娘？渠红岩在《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大自然的众多花卉之中，桃花是最能代表生命和活力的，这与人生的青春，尤其女性的青春极为吻合。再者，桃花粉嫩的花色和靓丽的姿容与青春美丽的女子在视觉上有着相同之处，这是两者之间关系建立的直接因素。此外，《诗经》时代是希求生育的社会意识盛行的时代，桃



明 蓝瑛《桃花渔隐图》

【桃花流水】

在蕴含“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作品中，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可谓妇孺皆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吕氏春秋·仲春记》言：“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礼记·月令》又言：“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先秦时，桃花开始作为物候之像出现在文献中，诸多史料之共同点，便是以桃树开花和雨水渐多作为春天到来的表征。

《山海经》中对于“河伯”的记载，以及《春秋传》中关于祭祀河神的叙述，都描绘了古人对水强烈依赖的现实。仲春之月，雨水渐多，经历了冬季休农之后，人们对春季的到来翘首以盼。另一方面，桃花盛开于百花未放的清明前后，这很容易成为一种农耕信号，即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说的“三月三日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

天赐甘霖，灼灼桃花。这两种物候现象的自然重叠，让古人认识到“雨水”和“桃花”的出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便是“桃花流水”意象的最初意义。

渠红岩在《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一书中提出，经考证，“桃花水”较早出现在西汉韩婴的《诗外传》中，即“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氛秽”。结合《东观汉记》《新论》等文献中共同使用的“桃花水”的表达方式看，其在汉代已经成为春季河水的代称。“桃花”盛开和“雨水”增多是“桃花水”的基本特征与表现，而“桃花水”是先秦文献中“桃始华”“始雨水”的内在意义与外在形象的结合，这种结合促使“桃花水”成为后来文学意象的基础与潜在动力。

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桃花水”开始由一种自然现象逐渐转变为文学意象。“桃花流水”在长期的文学发展历史中分化出了四种不同

的景象。无论“人面桃花”的原型是诗人所爱慕的红颜女子，还是所欣赏的优美风景，均给人以生之欣喜。待到诗的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情感基调便急转直下，反衬出人生盛衰之感。崔护在《题都城南庄》中含蓄、凝练的表达，向人们描绘了“人面桃花”的美好景象，而这种景象成为后世诗词作品的固有意象的，还要归功于唐代孟棨在《本事诗》中刻画的生动情节：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人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树，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睽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门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的文学意蕴：

清明前后，流水潺潺，桃花灼灼，文人墨客将这两处景象构成一个视觉和弦，以“桃花流水”的意象呈现于文学作品。前有北周王褒《燕歌行》中“初春雨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后有宋代欧阳修《送宋次道学士赴太平州》的“古堤老柳藏春烟，桃花水下清明前”，可见，“桃花流水”作为历代文人描绘春色的常用文学意象，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春景辞藻。

在中国桃文化的发展史上，两汉、魏晋是极力张扬桃之灵性色彩的时期，不谢的“桃花”与常清的“流水”，成为传递仙境信息的“青鸟”。基于此，后世文人常常用“桃花流水”的意象来描绘福乐无边的仙境。最著名的当数唐代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此外，“桃花流水”的仙境意蕴在绘画领域亦有呈现，如元代吴师道《仙居图》就有题词曰：“云气参差青嶂，树林缥缈飞楼。谁识仙家归路，桃花流水渔舟。”

在蕴含“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作品中，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可谓妇孺皆知。有研究者分析指出，西塞山前，桃花盛开，鸥鹭时起，晴笠雨蓑的渔人，恋秀色以支颐，临清流而忘归。如此令人旷神怡的山水境界，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道，被历代文人视作超脱境界的象征。

桃花开时极为明艳，然而花期短暂，之后便匆匆凋谢。因此，桃花的凋零常与红颜的暗老、年华的易逝、爱情的失落相联系，用以表达对生命流转的哀伤和慨叹。前者有刘禹锡《忆江南》：“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后者如宋代魏夫人《减字木兰花》：“玉人何处。又见江南春色暮。芳信难寻。去后桃花流水深。”“桃花流水”早已由春日象征这一原始意义，发展为人类千百年来所共有的情感蕴涵。

（因版面有限，本文做了删节。本版图片选自百度网。）